

《弱者的武器》

曾丽萍*

(CHUNG Lee Peng)

詹姆斯·C.斯科特 (James C. Scott), 郑广怀、张敏、何江穗 (译), 《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江苏: 译林出版社, 2011。ISBN: 978-754-4717-25-0

美国政治科学及人类学学者斯科特 (James C. Scott) 曾于1978年至1980年在马来西亚吉打州一个马来农村塞达卡 (化名) 进行田野调查, 1985年出版了其影响深远的著作《弱者的武器: 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出版后至今约三十年, 该书仍然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 其中印度尼西亚文译本于2000年由印度尼西亚出版社出版, 中译本则由中国南京译林出版社于2007年初版, 2011年再版。(注: 中译本书名为《弱者的武器》, 删除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以马来西亚吉打小农村 (约70户人家, 300多人口) 的马来农民为研究对象, 以70年代国家农业改革“绿色革命”带来的改变——包括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传统价值等为研究起点, 从中探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这本著作在马来西亚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回响, 读者群大概只有学术界相关领域的学者或学生, 非常小众。事实上, 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 斯科特虽非正式的人类学者, 但却善于人类学写作, 能从说故事开始、带入情境后再做理论分析, 理路非常清楚, 深入浅出, 深具启发性。

《弱者的武器》一书乃探讨底层人民抗争的代表性著作。斯科特的目的非常明确, 他认为过往学者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给予太多关注, 不是把农民视为历史行动者, 就是一群“征召、税收、劳动力流动、土地所有和粮食生产的统计数字而默默无闻地存在。”(页34) 斯科特不同意如此两极化的视角, 他认为, 在历史上农民大规模的公开抗争是非常罕见的, 若真的起义, 也总是被轻易镇压。他批评学界在不是英雄就是政治被动者的学术偏见下, 看不到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抗争。

因此, 斯科特要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 他把视角着重在“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斗争”(页35)。斯科特观察到的农民日常反抗包括: 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这种日常的反抗形式并无组织性, 不会事先协

* 曾丽萍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讲师。电邮地址: lcepeng.chung@newera.edu.my

调，但会在农民之间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有时能有效改变或减少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

斯科特用了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形容，描述这种小刀锯大树是怎么产生的。他说“正如成百上千上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为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页4）斯科特认为这些小型的、琐碎的、看似无关痛痒的小反抗，能在无意促成下集合成一股颠覆的力量，进而表现出农民的政治参与。

斯科特并不停留在农民的外在行动模式，他进一步探究了农民和“那些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他认为，若要充分解释农民的反叛行为，应进一步了解农民的思想观点、他们的语言和意识，他们在多少程度上接受精英宣传的社会秩序观。因此，研究者必须考虑农民的文化、他们“幕后的”评论和交谈、他们的谚语、民歌、历史、传说、笑话、语言、仪式和宗教（页49）。

因此，斯科特既论证了底层阶级会在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中进行反抗有权阶级，同时也肯定了底层阶级会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意识形态的抗争。他在最后一章反思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有力地指出：

“当葛兰西宣称从属阶级的激进主义更多地存在于其行动而非信仰时，我确信他是被误导了。事实几乎完全相反，行动领域——特别是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下——正是被统治阶级最受制约之地。而恰恰是在信仰和解释层面——在这个层面他们可以安全地冒险——从属阶级才最少受到束缚。”（页389）

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学术历史不长，从1940年开始，其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不断随着世界局势而变化，是一门活泼、多元的学术领域。较显著的改变是从二战后，许多殖民地独立建国成为新兴国家，这些新兴国家无论是在政治或社会制度上，为了融入国际社会皆不约而同地往西方现代化模式发展。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免不了和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价值产生冲突，因此，过往着重关注传统政治组织的政治人类学者，开始有了不同的关注对象。中国学者董建辉就指出，70年代后政治人类学研究出现了三个主要趋向：一、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对全球的影响；二、重视弱勢的边缘群体研究；三、关注当代国际政治问题。其中，斯科特是研究边缘群体的重要学者之一。（董建辉，2003）

作为政治人类学者中关注底层阶级的一员大将，斯科特的研究贡献是巨大的。他即有政治学及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又能融会贯通地将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在一起。他即有能力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又有能力在田野里捕捉到各阶级的语言符号、文化默识、社会潜规则等，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交叉辩证，使论述层次丰富及深入。

斯科特的学术关怀总是围绕在农民研究，除了《弱者的武器》，1976年出版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92年的《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以及2009年《不被统治的艺术》等重要著作，皆企图在国家宏大叙事的话语霸权下，挖掘不为人知、被压制的底层另类叙事，论证底层人民的积极能动性，进而寻找颠覆体制的有效方式。

马哈迪主政后的马来西亚朝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廿一世纪的今天，社会主要的冲突及矛盾，也从过往传统农业社会及工业资本主义的对立，转为城市贫民 / 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但斯科特的底层抗争理论仍然充满启发性，现代管理对待人的方式，是去人性化的官僚制度和科层管理，其所内嵌的权力不平等关系，一如塞达卡的贫农和富人。

我们要如何反抗？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斯科特从三十年前就提醒我们：无权力者并非沉默、无知的，底层大众日常形式的反抗有其重要性——小小珊瑚虫聚集形成的珊瑚礁，终能使大船沉没。

参考文献

董建辉，2003，〈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趋向〉，《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